



学府往事系列
主编／李子迟

大师讲学记

XUEFUWANGSHI XILIE
DASHI JIANGXUEJI

——讲坛上的大师身影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讲学记:讲坛上的大师身影 / 李沐紫,许毕基编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88-0002-6

I . ①大… II . ①李… ②许… III . ①知识分子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民国
IV .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3911 号

责任编辑 张慧泉 秦 天

装帧设计 兆天书装

书 名 大师讲学记:讲坛上的大师身影

作 者 李沐紫 许毕基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热线 0531-86131731 86131730 86116641

编辑热线 0531-86131719 86131720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 24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00 千

定 价 35.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电话:0531-86131736

前　言

本书涉及的人物，都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显赫一时的文化学术名流，堪称当时大学教授群体的一个缩影和代表。这些教授们讲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而且令人难以忘怀；即便是他们讲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先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沉，有心者才能体会；有的虽口才不佳，却质朴、扎实、丰厚、广博。

听大师们讲课，如醍醐灌顶、春风拂面，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作者试图以宏观的背景、独特的视角，反映大师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胡适的优雅、马寅初的激烈、李叔同的多礼、熊十力的性情、冯友兰的拙朴、沈从文的天真、黎东方的生动、雷海宗的磅礴、林语堂的幽默……

再回首，这些著名学者、教授们的陈年往事，原来竟是如此丰富、真实、鲜活、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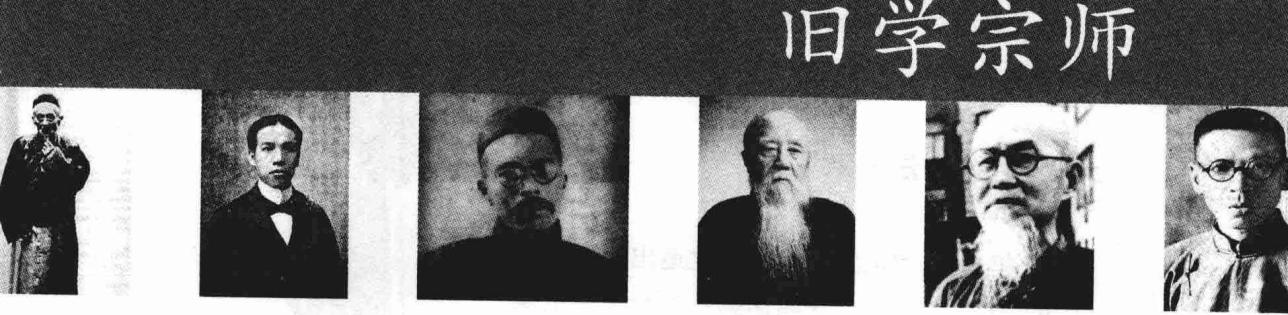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旧学宗师	1
辜鸿铭 辫子马褂却学贯中西	2
章太炎 香烟与粉笔同书	9
梁启超 但开风气不为师	15
王国维 前清遗老与旧学泰斗	24
刘师培 政治保守的文学史鼻祖	30
马一浮 “会通”教育观早于今人数十年	36
熊十力 真君子，真性情，真学问	42
黄侃 “三不来”教授	51
陈寅恪 万里独步成绝学	56
刘文典 狂傲不羁的“太上教授”	64
汤用彤 打通古今中西，授课一泻千里	71
梁漱溟 不做北大教授，要搞乡村建设	78
钱穆 讲学坚持以史救国	84
第二章 ◎人文大家	95
陈独秀 有性情也有眼光的新文化运动舵手	96
李叔同 劝诫学生还要加一鞠躬	102
鲁迅 启发式教学发人深省	108
马寅初 “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114
周作人 讲课如话家常，而又谨慎吞吐	119

杨振声 推动现代文学的教育家	124
胡适 丘吉尔式的演讲作风	131
赵元任 教我如何不想“他”	136
顾颉刚 “期期艾艾”而博学广博	141
吴宓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46
林语堂 “幽默大师”在讲坛上	152
冯友兰 大音希声,大巧若拙	159
金岳霖 把逻辑学讲得生动有趣	165
闻一多 诗人 + 学者 + 民主战士	172
潘光旦 对孔夫子“四体投地”	182
老舍 “逸兴遄飞时,常有妙语脱出”	187
唐兰 古文字学权威的课很叫座	196
沈从文 创作、教书均怀赤子之心	201
雷海宗 回荡在教室里的洪钟般的男中音	208
梁实秋 国立青岛大学的“名士”生活	216
黎东方 堪称 60 年前的易中天	223
钱钟书 “围城”里的中国式才子	229
第三章 ◎科学巨擘	235
马约翰 “中国体育教学第一人”	236
李四光 “石头也会变麦芽糖”	242
茅以升 “启发式”教育法与治学育人“十六字诀”	246
吴有训 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	252
叶企孙 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石	257
苏步青 西南偏僻山洞里的数学课堂	263
周培源 单骑走联大,桃李满天下	268
吴大猷 物理学大师及大师之师	274
华罗庚 不是“讲学”是“学讲”	281
参考文献	286

第一章

旧学宗师



辜鸿铭

辫子马褂却学贯中西

1867年，10岁的辜鸿铭跟随他的义父布朗，从南洋马来半岛前往英国爱丁堡，以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西学。那时，辜鸿铭不懂德语，布朗说一句，辜鸿铭就照着背一句，总共6500多行的无韵诗，他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在爱丁堡，辜鸿铭背熟了莎士比亚戏剧，又开始背诵歌德的《浮士德》。1年后，辜鸿铭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此后，又到德国莱比锡、法国巴黎求学，接受西洋正式教育。他通晓9种语言，终成精通西学之人。

正是这了得的背书功夫，成就了日后的辜鸿铭。多年后，他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不带讲义，不带教材，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兴之所至，随口而出，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学生们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北大教授“约法三章”

1917年7月，辜鸿铭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辜鸿铭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依旧遗老装扮，头戴黑缎面平顶瓜皮帽，身穿方马褂，脑后拖着用红丝线夹编而成的辫子，踱着四方步来到教室，立刻引起学生们的一片惊讶和一阵



辜鸿铭



辜鸿铭在北大



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

哄笑。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脑后的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他不为所动，待笑声平息，便与同学们约法三章：

“今后，由我来给诸君主讲英国古典文学。但听我的课，须约法三章。第一，凡我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要起立；上完课我不先走，你们不能出去。第二，凡我提问或你们有疑虑时，都必须站起来说。第三，凡我指定要你们背诵的文章，都必须背得下来，否则不能坐下。假如有谁受不了的话，请现在就退出。”

辜鸿铭上课从来不带任何讲义、教材，径直走上讲台，便开始滔滔不绝地陈述起来：“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 7 国国风。”辜鸿铭告诉学生：“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 10 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

学生们遵照他的指示，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由于他学问深厚，授课时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中外古今，无所不能，常以耸人听闻的怪论取胜，又以自圆其说的诡辩掀起高潮，最后在语惊四座的嬉笑怒骂声中收场。但他的怪论也好，诡辩也好，嬉笑怒骂也罢，又统统都是学问。因此，他的课极为叫座，不管刮风下雨，抑或寒凝大地，场场爆满。听得那些傲岸的北大学子，一个个瞠目结舌，呆如木鸡，“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曾是他学生的阎震瀛，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

辜鸿铭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凡他所教授的外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来作一番比较。如他把英文诗称为中国的《诗经》；把密尔顿的长诗《失乐园》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还将孔子思想与歌德精神相互参比，把《论语》中的一些观点用西文典籍中的类似论说来印证，说明中西异途同归，合为一辙，道不远人的观点等。曾与辜鸿铭合作翻译出版《论语》的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曾这样评价他：“他是罕见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接受了东方圣贤和西方圣贤——特别是歌德的教诲。”

由于他以学生们所熟悉的中国作家和哲学观点来讲授西方古典文学，学生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他在列举这些作家、诗人们的怍品时，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人们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其惊人的记忆力让所有人折服。即使到了晚年，他还能把弥尔顿六千五百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嬉笑怒骂，妙语连珠

胡适初到北大任教时，非常年轻，又提倡新文学。辜鸿铭对此恼火至极，从不拿正眼看他，并时不时地加以冷嘲热讽，说胡适讲的英语，是美国的乡村土语，与高雅风马牛不相及。胡适开的哲学课，更是让人笑掉大牙。辜鸿铭说，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他讲哲学，岂不是误人子弟吗？

1919年五四前后，他曾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1917年，辜鸿铭积极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他只好又回到北大教他的英文诗。当时北大内外有些人很不理解，激进的师生们甚至送给他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辜鸿铭一时很是落寞。蔡元培顶着压力，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我希望学生们跟他学好英文，而不要学他去拥护复辟。”

1919年6月初，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威逼，自动请辞离开北京大学。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众口一词，毫无异议地挽留蔡元培，辜鸿铭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的理由却很特别，甚至有点出人意料：“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可见他时时不忘皇权，仍然不改遗老思维。他的这一滑稽之言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把本来严肃的场合搅得不严肃了。辜鸿铭仍意犹未尽，在课堂上还不忘对学生们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1919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当时的英文教授辜鸿铭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他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因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举了一个例子，以此证明其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声音很小），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且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由此可见，少了那个“王”字，能行吗？’”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里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都对他彬彬有礼。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北大来了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这人刚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就见辜鸿铭窝在沙发里，头上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着油光闪亮长袍，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英国教授用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辜鸿铭，

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不禁有些吃惊，心想：没想到这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又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位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辜鸿铭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顿时，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了休息室。

辜鸿铭言辞敏捷，辩才无双。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来。毛姆没办法，只好自己找到了他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吗？”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辜鸿铭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 20 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 20 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一时无言。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很野蛮时，他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3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固有特征。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淳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却拥有这3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这4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沉默。

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鸿铭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则批判他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今人李国文为其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这正指出了他身上最可贵的一面,也是很多中国

人所缺乏的。

※ ● ● ● ● 【人物小传】 ● ● ● ● ※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槟城)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因此,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学业完成后,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师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辜鸿铭促使了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的诞生,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章太炎

香烟与粉笔同书

中国近代史上，能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者并不多见，章太炎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因敬慕反清思想家顾炎武的风概，更名绛，别号太炎。他反清、反袁、反蒋的革命事迹，以及慧眼独具、超迈前贤的学术文章，为世人所敬仰。尤其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这样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所表现出的风骨、情怀和品格，更值得后人追怀。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他以战斗的文章，鼓动风雷，掀起惊天巨浪；他仗义执言，不畏文祸，不苟且偷生，敢“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

此外，章太炎的“疯癫”与“疏狂”，在民国学术界也是出了名的。他曾经扬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堪称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创立的“章氏国学讲习会”，门下弟子无数，为传播国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激进学者，不废讲学

章太炎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个不折



章太炎

不扣的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一些激进的行为。他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想咒就咒，图的就是个酣畅淋漓。

1902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住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从报》馆。他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天回国后，他重新改定《訄书》（即《訄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计划撰写《中国通史》，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

此间，他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激怒清政府，被捕入狱3年。1906年，章太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从报》的论战。在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他发表在《民报》上的文字，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此外，他还撰写《中华民国解》，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自1905年起，章太炎不仅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还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晚清“苏报案”期间，章太炎曾经在法庭上与审判员当庭对峙。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的“载湉小丑”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一头雾水，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判才好。其中一位审判员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地探问：“您得自何科？”章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又一次引起满庭哄笑。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政权被袁世凯窃取，章太炎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为帝制复辟所代。1914年1月7日，章太炎因刺讥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被袁氏软禁于北京龙泉寺、钱粮胡同等处。他虽在苦闷中独处，但得闲时，即对其思想学术进行认真的整理。在此期间，他复取《訄书》增删，更名为《检论》，对儒学的认识又较以前更为深化。

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社会失序、信仰危机、道德失范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

下,章太炎大力宣讲国学,主张分清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提倡儒家道德中的优秀成分。章太炎认为,弘扬国学与尊奉孔教,两者有根本之区别。前者是积极继承,扬弃创新,后者是消极保留,迷信守旧。

1913年冬,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处墙上贴出一张通告,其中说:“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都绝对不能相混。”章太炎倡导用儒家道德补西方物质文明的不足之处。他对比了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以为“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至于佛家,虽然也讲心,但“不切人事”。通过比较,章太炎以为儒家道德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

1922年4月1日到6月17日,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邀请,在上海主讲国学,每周1次,共讲10次。当时,听者云集,约三四百人。章太炎撷菁采华,用浅显易懂的方法引领初学者入其门径。有的听者后来回忆说:“10次课之后,胜过闭户读书3年。”

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认为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历史学可以唤起青年的爱国之心,研究历史学最为切要。

同月31日,章太炎应北平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的邀请,演讲《清代学术之系统》,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条分缕析,作了全面评述。

4月22日到26日,章太炎用3天时间,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讲《广论语骈枝》。

5月29日,章太炎在青岛大学讲演,发挥“行已有耻,博学于文”的精神,激励青年学子增进人格修养,增强爱国之心。秋天,他南行苏州,继续讲学。

1933年1月,章太炎、李根源、陈衍、金松岑等人仿效顾炎武读经会,成立了国学会。国学会以“扶微业,辅绝学”为目标,组织讲学。章太炎还起草《国学会会刊宣言》,以告天下,强调砥砺名节,振起末俗的精神。

同年3月,章太炎应无锡国学专门学校邀请,赴无锡讲学。无锡国专为当时的国学重镇,始办于1920年,初名国学专修馆,著名学者唐文治为馆长。1928年改名后,唐文治任校长。无锡国专师资雄厚,当时著名的国学名家陈衍等人在此多次讲学。3月14日,章太炎在无锡国专讲《国学之统宗》:“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散漫,必以约持之道,为之统宗。”“社会腐败,至今而极,救之之道,首须崇尚气节。”“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